

修辞

汉语修辞 艺术大辞典



Han Yu Xiu Ci Yi Shu Da Ci Dian

XIU CI

Han Yu Xiu Ci Yi Shu Da Ci Dian

主编 杨春霖 刘帆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

主编 杨春霖 刘帆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HAN YU XIU CI YI SHU DA CI DIAN

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

杨春霖 刘 帆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临潼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5 插页 1819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 10000

ISBN 7-224-02765-0/·H·83

定价:45.00 元

主编 杨春霖 刘 帆

撰稿(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鸣春	王军虎	史马力	白慧芹
刘 帆	李玉萍	李荫禄	李 林
李 伟	师亚丽	孙爱国	孙晓红
孙 硕	宋 雯	张蕴华	陈 冰
郑东平	赵 明	姜淮超	贾小玲
晁农平	程 捷	魏宏建	

《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编写分工

主编 杨春霖 (阅稿、审稿)

主编 刘 帆 (提供理论观点, 决定体例, 撰写全部修辞方式释文、负责全书的补稿、改稿、审稿等工作。为飞白、返射、设问、示性、舛互、同异、反问编选例句, 撰写评析文字)

编选例句和撰写评析文字(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鸣春 (歧义、顿跌)

王军虎 (倒装、转类、镶嵌、藏词、省略、节缩)

史马力 (移就、对偶、歧疑〈部份〉)

白慧芹 (换算、易色、拈连、析字、析词、仿拟)

李玉萍 (感叹、提顿)

李荫禄 (比喻、列锦、迭现、序换、跳脱)

李 伟 (诡谐、歇后)

师亚丽 (夸张、物候、顶真、回文、回环、拟人)

孙爱国 (比兴、借用、排除、降用、抑扬、补正、换述、异语)

孙晓红 (图示、夹杂、矛盾、异称、升华、衬字)

孙 硕 (同语、迭映)

宋 雯 (通感、断取、精警、敬谦、移时)

张蕴华 (反复、借代、错综、引用、象征、婉曲)

陈 冰 (示现、旁逸、讽喻、歧疑〈部份〉)

郑东平 (巧缀、曲解、统括、伸缩、繁复)

姜淮超 (排比、双关、互文、层递、呼告、例反、换义、奇设、偏语)

贾小玲（摹绘、闪避、别解、谲辞、讳饰、衬跌）

晁农萍（叠字、复辞、同字、衬托）

程捷（精细、联用、联边、析数、释词、增动、疑离）

魏宏健（对照、合说、分说）

另有李林、赵明二人参加部分审稿、改稿工作。

凡 例

1. 本《辞典》收录汉语修辞方式 103 种。含小类 256 个,异称 140 个。
2. 正文中修辞方式按语义类、布置类、辞趣类、和文学类的顺序排列。为了查阅方便,另编有音序索引。
3. 每种修辞方式都包括释文和例析两大部分。释文含有定义、特点、作用、种类、辨析、用法等内容。例析则分例句和评析两部分。
4. 为了保持纯正的汉语特点,外语和民族语的译文例句不收。
5. 正文中全部修辞方式的释文由主编执笔,后面的例析则分工到具体个人,文后不另行署名。

序

我们使用语言(在本序文中,语言只指汉语的书面语或口头语。下同)都要求通顺、准确、无误,如果做不到,那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这一点尽人皆知;但是还有一点,即在通顺、准确、无误之上最好还要讲求形象、生动、优美,因为仅只通顺、准确、无误,那吸引力会很弱,语言的效果也就不会大;只有再进一步做到形象、生动、优美,才能令人百读不厌或百听不厌,对所表达的内容深感兴味而乐于接受。这一点对从事宣传、教育等工作的人更加重要。其实在任何场合,一个只会使语言通顺、准确、无误的人,其效益肯定比不过一个语言已达到形象、生动、优美境界的人。以上所说,表明学习修辞——即上面说的讲求语言形象、生动、优美的重要。尤其是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大力发展经济,改换江山旧貌的时代,运用语言的机会越来越多;怎样运用语言,即怎样写文章、怎样说话的问题日见其重要。形势逼人,不在修辞这方面下点工夫是难以十分顺利地取得某些方面的成就的。学习语言的人只有进一步掌握若干修辞手法,才能使自己的语言修养达到高峰而为民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下面先举几个前多年出现在民间的有趣的修辞例子:

1. 揭露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说: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买茅台酒送礼行贿,有些干部也就竟然接受了,再给送礼人办不正当的事。但一样的意思,不如有人这么说:“买茅台酒的人多,真正自己喝的有几个人;喝茅台酒的人不少,真正自己买的有几个人。”显得精练、含蓄、耐人深思。

2. 宣传计划生育,说一些经常听到的道理和法规,难免平淡、一般,引不起听者的注意。不如有人这么说:“少养孩子多养猪。”一句话还把发展生产的精神联系上了,而且把“孩子”和“猪”相提并论,令人忍俊不禁。七个字真是出色无比,一下子人就都记住了。

3. 说人变脸生气,不开门见山地直接表示而是使了个气象用语“晴天转多云”。十分生动有趣。我想那位变脸生气者,听了此语,恐怕马上会笑容可掬,怒气全消,绝不至于变本加厉,越发不高兴。而且即令是说一些别样安慰性质的话,也未必能收到这样的好效果。

4. 假若一个男青年对一个女青年表示爱情时说希望她永不变心,不要半路上抛弃了他。清楚、合理,没有什么不对,但不如有个小伙子说成:“希望你是个永久牌,不是个飞鸽牌!”用自行车的两个牌子巧诉衷情,非常幽默、形象、生动,不同一般,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赏识。

语言的如此表达,实际上是一种运用形象思维的语言艺术,语言而成为艺术,自然就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语言表达取得了最大最佳的效益。同时,这种语言艺术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几千年,不过一直被称作“修辞”。修辞的含义,两位著名修辞学专家陈望道、郑子瑜两先生共同认为:修辞包含有两义:一是“修”为修饰,“辞”为文辞,修辞即为修饰文辞;一是“修”为调整,“辞”为词语,修辞即为调整词语。郑先生还在其专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中举例为第二义作证。如:消极的“屡战屡败”之调整为积极的“屡败屡战”,音节欠和谐的“泉冽而酒甘”之调整为音节和谐的“泉甘而酒冽”等。于是,修辞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许多上古典籍里都提及修辞的功能。如:“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身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辞欲巧”(《礼记·表记》)等。所说之“文”、“巧”即指语言的文采绚丽,安排巧妙。此外,自古迄今,每一朝代又都有关于修辞的著述。郑莫、谭全基编著的《古汉语修辞资料汇编》只节录各家著述的精采部分,收集成册而字数竟达五十五万两千之多,于此可见各朝各代的文人雅士崇尚修辞,护持此道的热心表现。

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杰作《修辞学发凡》问世。这是中国第一本推陈出新、前无古人的修辞专著,后来居上,风行天下,为我国的修辞研究打下了新的基础。不过,陈先生将修辞划为两大分野;一为消极修辞,一为积极修辞。前者以写作合乎语法规范、通顺、简洁、明确、贴切为标准;后者始以偏离常规,着眼于修饰、美化,刻意追求艺术性效果为标准。这似乎不大合适,有改变的必要。因为消极修辞与学习汉语语法、词汇要求的内容直是一体,没有再保留于修辞范围中的必要。修辞是一种语言表达的特殊技巧,尽管与一般写作有密切关系,但显然区别于一般写作的表现方法,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修辞只能是积极修辞,消极修辞干脆全部合并到一般写作中;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处理。

基于以上的论述,可知实即语言艺术的修辞,对人们非常重要;掌握了就能写出回肠荡气、感人至深的文章,说出有声有色、委婉动听的话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二十几个人联合起来,打算编写一部修

辞学方面的专著,给学习的人开个方便之门。但是不愿一味醉心于理论;这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学术水平不高,承担不起;一方面高谈阔论,容易脱离实际,读者得不到多少益处。于是,最后敲定集体编著一部《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我们下决心要把这部辞典编成具有学术性、鉴赏性、资料性、应用性的修辞工具书,尤其是特别重视人人欢迎的“应用性”。我们是把修辞作为一种应用科学来看待的。我们给读者提供的内容可以说并不是修辞学而是修辞术。这部辞典又是修辞研究成果的总结,目的仍然在于提高读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阅读鉴赏能力。

此外,这部辞典还有三个最大的特色,分别说明如次:

1. 众多的辞格——修辞离不开辞格。辞格就是进行、实现修辞的方法、方式或手法。也叫修辞格、辞式、修辞格式等,一般多称辞格。如博喻、夸张、拈连、飞白、曲解等,皆辞格之名称也。辞格究竟有多少?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定不下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有三十八个辞格,但陈先生说:“各格之中又有若干式。别人说的一格,往往只当本书的一式。若把各式尽作一格算,总计当有六七十格。”近人黄民裕《辞格汇编》有七十八格。近人濮侃《辞格比较》谓:“现在被一般修辞著作当作辞格论述的约有五十来种。”然而我们编写的这部《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却有一百零三个辞格;而且和《修辞学发凡》相同,一格之中还有若干式。如:第一个比喻一格就包括了明喻、暗喻、借喻等十三个“喻”式。如果也把“格”与“式”全部加起来,那就绝不是《修辞学发凡》的“六七十格”而会多得惊人。“格”的数量增多是化了极大的精力,在长时间里综合、离析,精心整理的结果,也许已经把所有的辞格都网罗进来了。只要尚未出现新辞格,目前我们的数字是可靠的。

2. 丰富的例证——了解辞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体味作品绝妙之处何在,从而加以效法,逐渐使自己也达到腹藏锦绣、妙笔生花、词吐琳琅的境域。但辞格又是从我国古今优秀、出色的作品中研究、总结出来的。没有作品,不接触作品就又难以理解、领会辞格。因此,给读者介绍辞格是重要的,但提供例证也不是不重要。这就是这部辞典之所以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上至先秦,下及当代,搜集例证资料达一万五千余条之多的原因。同时,例证不仅广博、丰富,花色璀璨,而且还十分注意其典型性,突出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艺术之神采。这是使用形象的手法来解释辞格;虽则并不是从这部辞典才开始,但这部辞典的例证之丰富却远远超过了其他同类著作。这些例证的搜集,大家可以想见是很费力气的。虽然需要的只是精采动人部分,但不

能不通盘仔细阅读;在阅读过程中还必须动脑筋寻找合乎某个辞格的资料;因而还往往要反复思考,细心采撷,其难度确实不小。为了使读者满意和得到好处,我们在从1988年元月到1992年元月整整四年的时间里做的全是这类的工作。不过,兴之所至,虽则劳累,但没有感到劳累。

3. 恰当的评析——有了辞格,有了例证就能够将这一辞格运用之妙了然于胸的人不是没有,但不可能也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而且容或不了解、体会不来的人还占一定的数字。这就是非要评析不可的理由。当然,读者自己不辞辛劳,尽量努力思索揣摩,未尝不能探骊得珠,但颇费宝贵的光阴,还往往由于并非自己的专业而得不到正确答案。于是,评析还是极其需要的,对读者会起到很大的引导、辅助作用。不过我们的评析也并非是绝对确切、中肯,字字在行。限于篇幅,我们又难于尽情发挥,加强深度。因而还是要请读者相信自己,多多思考,在我们评析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得出更为深刻、精到的评析来!评析得越好,对作品理解、欣赏得也就越到家,自己获益也就越多越大。这可以成为读者学习、提高的一个好方法。但愿读者能够从这个未必成熟的评析中有所领悟,获得创见,再上一层楼,那我们的煞费苦心就更加有意义了。

现在来信手举几个这部辞典的内容片断供大家先睹为快并作为此序的结束。

1. 曲语格: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通过描写与本意相关或相类事物来烘托、暗示本意的婉曲形式。

例证: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

评析:好久没有接到家里的书信,思念极切,可是回家途中离家越近越不敢向来人打听家里的消息。作者没有把“害怕听到家人的坏消息”的意思直接说出来,但这种又喜又惧的感情矛盾和对亲人的无限关心,却被表达得淋漓尽致,深切感人。

2. 严式回环格:回环是用前一句的结尾做后一句的开头,后一句的结尾作前一句的开头,形成回环往复的形式,以表现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的修辞方法。严式回环则是由结构和语词相同的两个分句构成的回环往复的格式。

例证:摔碎了泥人再重和,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评析:民间文学来源于民间,自然最能表达出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这首叙事诗所表达的,正是农村青年男女那种朴质、真诚、热烈的爱情愿望。没有金钱物质的诱惑,没有门第观念的阻隔,有的只是情感的融合与彼此奉献的美好愿望。“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一句,将这种感情描述得更朴实更纯真更动人。

3. 引述式讽喻格:讽喻是编造一个故事或引用一个寓言来说明事理的一种修辞方式。这也可以称为引述式讽喻。

例证: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十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也。(彭端淑《为学》)

评析:引述四川两个和尚朝南海的故事作比喻,论述难与易的辩证关系,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励人们刻苦奋进。同时,讽刺具有好的条件而不去努力的人,只能一事无成。

4. 字面错综格:错综是一种为了避免语言的呆板、单调,有意将相重或整齐的词语、句式变换成不同的词面或参差不齐的语句的修辞方式。为了避免上下文字字面的重复,有意换上同义或近义词语的称字面错综格。又可称为同义反复或避复。

例证: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儿却绿得发亮,小草儿也青得逼你的眼。(朱自清《春》)

评析:状物写景的色彩应尽量使读者感觉到细微的差别,“绿”和“青”本都属绿色,然而春天里树叶的绿和草儿的绿,就有些区别。看来作者调换词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避免重复,细腻地状物也是一种传达感情的方式;发亮的绿叶,柔嫩的青草,浓化了散文的意境。

最后,我借书序末尾的一点地方,向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社科联”)表示我们衷心的鸣谢,因为在这本辞典的编写过程中,社科联向我们热情地资助过。

杨春霖

1993年9月27日西安

前 言

中华民族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以此而表达出来的语言也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丰富、最生动的语言之一。几千年来，漫长的岁月积累了浩瀚丰繁的篇章，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不朽结晶，而且还显示出前人在运用语言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能否这样说，正是那些与内容相得益彰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技巧，才使得那些不朽的篇章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实践先于理论，再从实践中总结和归纳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中国修辞学的萌芽、发展、形成过程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公元前6——5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诗经》、诸子散文、楚辞，到其后的汉赋、《史记》、《汉书》、乐府诗，再其后的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笔记、传奇，直至现代难以数计的著述，无一不闪烁着修辞艺术的光芒。在历史长河中，那些熠熠闪光的名字，如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他们不仅以思想家、教育家、学者、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的声名彪炳千古，而且以他们的文字业绩，展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当然也展现了我国传统修辞艺术的卓越成就。

然而，尽管起步很早，作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科学，中国修辞学却形成得很晚。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科学的精辟见解，可是长期以来处于附庸地位，大都散见于历代文论、经解、诗话、词话与随笔、杂记之中。直至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标志出中国古代修辞研究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形成了“修饰文辞”的理论框架。“五四”以后，修辞研究风起云涌，三十年代陈望道先生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确立了“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科学理论和体系。从此中国的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科学的殿堂，但是，却又难以意料地停滞了半个多世

纪。

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学技术的新高潮,国内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的节奏在加快,空间的距离在缩小,社会交际范围在不断扩大,价值观念在不断更新,使得人们对社会交际主要工具的语言活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提高言语交际中信息传递的效率,增加言语表达的内涵,扩大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以反映人们日益开阔和深化的思维,适应高层次、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口语修辞和书面修辞的空前活跃,大大推进了修辞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传统的修辞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旧有的修辞理论和观念已包容不下实际存在的修辞内容。时代在呼求更加新颖,更加严密,更加完整的修辞科学体系。这种热烈紧迫的形势和局面,吸引了众多修辞研究者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并使我们萌发了编写《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的意图。

二

八十年代起,有关修辞学的研究和讨论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张志公认为“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张弓主张“修辞为语言艺术化手段”;吴士文以特定结构为标准提出了“辞格的特定类聚说”;林兴文认为“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希杰以美学标准进行辞格的分类,研究修辞的表达效果;刘焕辉则在对语言要素(音、义、形)的综合分析中,将言语表达形式,思想内容,题旨情境结合一体,提出了“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观”等等。尽管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是在一些要害问题上还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一、注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规律的研究,并将它作为修辞研究的重点,二、立足于运用的角度,明确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将修辞学与语法学、文艺学、写作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严格地划分开来。三、修辞学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应该将“功能”、“结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些精辟的见解,给人们许多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为建设新型的、科学的中国修辞学理论及体系奠定了基础,指出了较为科学的出发点。

新的科学整体观点告诉我们:任何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都不是哪一门科学可以解决的,各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已故的陈望道先生说过一句体会很深的话:“修辞是介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陈望道语文论集》第606页)深刻地揭示了修辞学和一

般语言学及文艺学、写作学的辩证关系。通俗点说,就是:修辞既有语言的属性,又有文学的属性,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探讨修辞的性质、特征、结构、方法等规律,要在它的建筑基础,语言与文学相交叉的中间地带进行。同文学一样,修辞是一种有着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言语行为,一方面它离不开语言材料(音、义、形;字、词、句),离不开对这些语言材料的研究和组合,不论这种组合是常规的、一般的,还是超常规的、特殊的。另一方面,修辞受“题旨和情境”的制约,为一定的表达目的服务,追求最佳的表达效果,具有浓烈的主观色彩。所以应该把修辞当做言语生成方式和表达技巧来研究。既要注重对它构成材料的形态、特点、性质、组合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稳固或稳固的手法与格式的研究,也要注重思想、情感、心理状态、审美观念、社会习惯、不同语体、交际环境、相邻学科等各种因素对修辞运用的制约和影响。其中运用是主要的,理论研究要为应用服务,才能显示出作为“应用科学”的修辞是提高言语表达效果规律的总结的性质。

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怎样理解“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的问题。为此,陈望道先生曾经作出了准确而科学的说明。他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学发凡》。以下引言同)“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离开了“意”和“情”,修辞活动就会成为无的放矢,失去价值和意义,也就无法评价修辞方式的好坏优劣。对于“题旨情境”的涵义,陈望道先生也有具体的说明:所谓“题旨情境”,指的是写说的主旨、目的、时间、地点、对象、上下文等方面。概括地讲,决定修辞运用的因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旨、目的是修辞意图和目的,属主观因素;时间、地点、对象、上下文是口语或书面语的交际环境,为客观因素。二者互相制约,相辅相成,构成辩证统一关系。片面地强调和注重某一方面,都会带来偏差和失误。当然这是个理论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人们对此并无多大异议。关键是实践,如何运用这种辩证规律来指导修辞研究和修辞运用。在这一方面,当前的修辞学界似乎是有些欠缺。例如:大多研究者并未跳出传统的“工具论”圈子,而忽视了修辞的主观性与修辞过程中主体的积极的能动作用。修辞是一种重要的语言交际工具,但是它的性质和作用又远非简单以“工具”二字概括得了的。因为,当修辞过程中融进了主观意识和审美追求时,语言修辞就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是人类所具有的哲学意识、文化精神、社会属性、审美心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和更深的涵义上研究修辞的属性和功能。

再则,传统的修辞学注重了修辞结构、形式、方法、功能的研究,却在考察语辞形成的全过程(即修辞过程)中留下了某些空白。一方面重视了题旨和情境对语辞形成过程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却对作为人类智能行为的修辞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思维规律、心理规律、审美规律缺乏深入的研究。在“修辞怎样适应题旨情境,是否有规律可循”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

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主体论的修辞观,其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修辞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学的剪裁配置,排列组合的符号运动,而是言语交际主体的‘修’和客体的‘辞’双重迭合的结晶……‘修’与‘辞’的组合而成的修辞,实质是主客融合的流动过程,是人们心灵的观照(修)而物化(辞)的结果。”(高长江《现代修辞学——人与人的世界对话·导言》)这段话看起来有点费解,但是却显示出修辞研究中的新视点,新角度。也许它正是对“修辞怎样适应题旨情境,是否有规律可循”问题答案的探索。冷静思索,不难发现修辞过程与文学创作过程有许多相通的东西。它们的目的都是在追求美,创造美,在表现方面又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和共同的规律(在思维、心理、审美等方面)可循,只要我们小心谨慎、严肃认真地将它们严格区分开来,是可以在其中的研究中,发现新的天地的。

广义地讲,修辞是一种言语表达技巧,是创造语言美的手段,它与写作有密切的关系,却又本质地区别于写作中的表现手法。技巧是智能活动,修辞和写作也是智能活动。文章是一字一句写出来的,离开语言和言语的组合,就没有篇章结构。可见修辞技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文章的优劣;再说修辞又是决定语言风格和语体风格的重要因素,关系到文章总体风格的形成,语言美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在表现方面又具有一些共同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修辞和写作确实很难截然划分。事实上,有许多被称为辞格的修辞手法,如对比、抑扬、起兴、谏辞、跳脱、示现、精警、象征、列锦、迭现、通感、炼字、繁复、精细、衬字等,如果不从谋篇布局的角度辨析,有时难以使人区别开,它们到底是修辞手法还是写作手法。但是,难以区别并非是不能区别,两者的界线还是很清晰的:修辞着眼于语言的修饰、美化、加工和运用,属于语言学研究范畴,主要限于以“传情达意”为目的,刻意追求词语和句子组合的表达效果。符合此标准的是修辞手法,超出这个标准的,则为写作手法。为此,有人提出修辞和写作联姻的主张,就其性质、作用而言,修辞同写作一样,具有提高阅读、欣赏、读写、作文的功能,这种设想值得重视和实践。

三

前面,我们用较大的篇幅探讨了修辞的文学性质,下面再谈谈修辞的语言性质。尽管修辞的性质并非是以“语言交际工具”简单概括得了的,但是,它毕竟是语言艺术化手段,是语言交际中的客观现象,所以它离不开语言文字,必然具备语言的、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客观性、社会性和普遍性。同语法现象一样,不懂语法的人,大多能说出符合语法规律的话语;没有专门学过修辞的人,也能在语言交际中普遍运用修辞。这样说并非是为了抹杀语法和修辞的重要性,而是为了说明语法和修辞作为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语法现象和修辞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交际中,而语法学和修辞学只是这些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的规律性总结。只要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些规律,将那些不自觉的语言交际活动转化成自觉的、含有思想情感、审美追求的智能活动,就能大大地提高语言交际的功能,把语言文字所表现出的思想内容上升到美学境界,从而反转过来说明修辞研究和修辞运用的重要意义。

前些日子,关于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的讨论着实热闹了一阵,至今仍有零星的锣鼓声。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能不能结合”,而在于“为什么结合”,“怎样结合”,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研究对象、范围、部分性质和规律再认识的过程。从科学的涵义上讲,两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语法是对语言结构规律的抽象概括,重在研究汉语词法、句法的特点和规律;修辞学则是在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规范化的基础上,研究言语的表达规律,追求语言的美化和艺术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法和修辞早已有着一定程度的交叉渗透。但是它们毕竟是两门不同性质的科学,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却不可任意融合、掺揉,以免产生畸形的怪胎。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和体系将修辞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部分。所谓消极修辞又称规范修辞,是一种合乎语法规范的修辞方式,以通顺、简洁、明确、贴切为标准。所谓积极修辞又称艺术修辞,是一种偏离常规的、语法规范不了的修辞方式,要求生动、形象和语言本身的美化。能否根据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将这两类不同修辞方式的具体内容作一番调整呢?科学实践证明:一切理论研究的最终结果,都要为应用服务,符合语法规范的消极修辞组合,最大程度地体现了语法组合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运用于语言实践,在